

华表的沧桑



牧惠杂文精选

牧惠 著


金城出版社
JIN CHENG PUBLISHING HOUSE

华表的沧桑

牧惠杂文精选

牧惠／著

朱铁志／选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牧惠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5-0970-9

I. ①华… II. ①牧…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038号



华表的沧桑

作 者	牧 惠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70-9
定 价	4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 朱铁志

姓名里头的文章·····	001
居其位而知其任·····	007
文字狱古今谈·····	011
华表的沧桑·····	017
唯上杂谈·····	021
闲话尾巴·····	025
朱元璋删《孟子》·····	028
海瑞墓前的沉思·····	034
想起了乌台诗案·····	041
“皮”、“毛”之论·····	049
昏君·明主·土皇帝·····	054
严肃的事情与不严肃的态度·····	057
为乌鸦鸣不平·····	060
驱除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	063
“给”的自由·····	066
跪的历史·····	069
当看客也不易·····	073
关于清谈的清谈·····	076

读《孟子》偶记·····	080
漫言身后事·····	084
煮鹤焚琴说愚·····	092
说吃人·····	097
从呼“万岁”到鼓掌·····	103
择祖配·····	106
四十七个“忍”字后面·····	110
烤鸭的片数与凌迟的刀数·····	113
一种“中国病”·····	117
考“黄”·····	123
并不纯洁的“纯洁思想家”·····	131
盗亦有道新论·····	134
繁琐的杀人手续·····	137
奴才并不易做·····	141
增加点艺术细胞·····	146
神缆与宇宙语·····	150
久违了，雅罗申柯·····	154
不该忘掉的血泪·····	157
狗道主义中外谈·····	161
歪脖树下漫语·····	167

谈谈替身·····	171
说“人言不足恤”·····	174
明朝的自宫热·····	178
帮闲不宜再帮忙·····	181
中国变色龙·····	184
强盗不可以白做·····	187
深入下层 与民同乐·····	190
我们不要乞乞科夫·····	193
不合时宜的聪明·····	196
贞操带、守宫和缠足·····	202
“私了”未必了·····	207
奴才、主子与人·····	211
“油”“水”之喻·····	215
自投文网·····	218
居无求安的理论与现实·····	224
胭脂河上天生桥·····	229
官与修衙·····	232
还刘秀以全貌·····	235
你们笑什么?·····	238
车匪路霸今与古·····	241
白毛女的命运·····	244

先研究后批判·····	247
红宝书与“三、百、千”·····	250
鲁迅与检察官的恩怨·····	254
常读常新的鲁迅·····	258
重提“时间就是金钱”·····	262
初级阶段的“民主”·····	266
说说维辛斯基·····	271
《朱元璋传》的两种版本·····	275
读《莫洛托夫秘谈录》·····	280
险哉弃权票·····	286
自由、宽容及其他·····	290
不合时宜的赵树理·····	298
太平军的世界知识·····	305
一份反面教材·····	313
堕落的必然·····	319
“运去”不由天·····	328
说说“人腊”·····	335
我读蓝英年·····	342
编后说明 / 朱铁志·····	351

姓名里头的文章

1840年，巴尔扎克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定稿之后，主人公还缺个好名字。为了决定这个名字，巴尔扎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他要求的条件是“适合于他的一切的姓名！他的容貌，他的人材，他的声音，他的以往，他的未来，他的趣味，他的热情，他的不幸和他的光荣，能说明这一切的姓名”。真没想到，写小说选名字还那么难。这一招是否有普遍意义，尚难断定。但是，有时候，恰当的名字对一篇小说确起作用。阿Q、孔乙己，光是名字，就引人注目。除此之外，在姓名问题里头值得感慨的是是非非，倒也真不少。

古时候大概不大重视名字，图省事，以天干定名：太甲，武丁，盘庚，高辛。这种习惯现在仍有所保留，或取名乙酉，或定名庚辰。阿炳、闰水，大约也是从这里派生而来。在那时，即使定名，也似乎不太注意高雅、吉祥。好些出名的人，他们的小名也很一般化：司马相如小名犬子，桓熙曾经叫做石头，范晔叫过砖儿，慕容农叫

做恶奴，元叉竟叫做夜叉；还有斑兽、秃头、龟儿、獾郎……不一而足。姓名的男女之别也不讲究。《孟子》里说的那个善捕虎的男人叫做冯妇；鲁隐公的小名叫做息姑；《汉书》里有一个男子叫丁夫人；唐朝李君羨小名王娘。《汉书》外戚传提到薄姬少时曾与赵子儿相爱，望文生义，一定以为薄姬是个女的，赵子儿是个男的，其实正好相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名字有了忌讳，最普遍的是不得对皇帝、对祖辈有什么触犯。朱全忠当了皇帝，梁朝把“中使”改名为“内使”，因为“中”字犯了“忠”字的讳。可以想见，在他统治下的人当然不能用“忠”、“中”之类字眼来命名。南唐主李昇夺得皇位，群臣争着请求把所有府、寺、州、县的名字凡有吴、杨的都加修改。因为李家是从吴国杨家夺得天下。这样一来，留守判官杨嗣也只好请改姓为羊。后来是李昇格外宽大，“皇恩浩荡”，才免掉了这一套。为了避免人们搞错，周宣帝干脆下令，凡是“天”、“高”、“上”、“大”这类字眼，都不准用作名字。姓高的一律改姓姜。宋徽宗规定，禁止用“圣”、“明”、“天”、“耳”作名字。“圣”、“明”、“天”至高至上，小民不得用，为什么连“耳”字也不准用？原来宋徽宗自封为道君皇帝，用“耳”字取名，有亵侮老子李耳这位“太上混元上德皇帝”的嫌疑。

元朝更彻底，干脆规定庶民都不得有名字，只许用排行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计为四十六，生下的儿子就叫做四六。明朝开国元勋之一的常遇春，曾祖叫做四三，

祖父叫做重五，父亲叫做六六；大功臣汤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六一，父亲叫七一。大概都是这样算出来的。

事实上，奴隶们往往都不准有自己的姓名，并非元朝才如此。只不过元朝做得干脆点罢了。晴雯原来姓甚名谁？有谁去关心过，查考过？甚至宝玉也不例外。她不过被当成一件礼物送给了贾母。然后为了使用方便，就叫她晴雯。至于她原来叫不叫晴雯，她喜欢不喜欢晴雯这名字，又同太太小姐们有什么相干？就像香菱，大观园里，谁人晓得她本来叫做甄英莲？旧社会被拉壮丁的人，往往也被迫忘掉自己的姓名，代替着一个素未相识的姓名。在法西斯集中营里，人们也不准有什么姓名，有的只是一个号码！赵太爷怒斥阿Q：你哪里配姓赵！又何止赵太爷不准人姓赵？

从不准姓赵到准予姓赵，从不准有姓名到有了姓名，那就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大恩大典。同贾母可以赐晴雯以名字一样，在封建社会，皇帝也作兴给人赐名赐姓。唐朝皇帝姓李，赐姓李，就是一种荣誉。同样，宋朝时赐人姓赵，明朝时赐人姓朱，也是殊荣。这样一来，会不会有不少本来不姓李、不姓赵、不姓朱的人也冒上了“国姓”？也许有；但是，更多的其实是随着“国姓”的变易又变了回去。唐末五代就是那样：一时人们纷纷姓李，一时人们又纷纷不姓李；一时让这个那个姓李，一时又不准这个那个姓李。同是一个孔循，最初被朱温收养，跟着姓了朱；后来跟着乳母姓了赵。梁亡事唐，他才改姓孔。到底他本来姓什么？连他自己也未必闹得清楚。这个梁太祖朱温本人呢？他姓过朱，也姓过李，后来又再姓朱。叫过朱

温，也叫过朱全忠；当了皇帝，才改名朱晃。皇帝这样赐来赐去，自己那样改来改去，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偶一疏忽，就会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难怪为了人名就得专门编本辞典供人查。

这样把姓名变来变去，无非是由自己身价同皇帝身价的起落和彼此间的关系好坏来调节。作为一种调节，皇帝还可以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赐以恶名恶姓。雍正赐两个兄弟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意思待考，但肯定是坏名字。王莽因讨厌单于囊知牙斯不够驯服，下令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汉桓帝诛梁冀之后，连梁姓也讨厌了，把那个改姓梁的邓后改姓了薄。隋朝杨元感造反伏诛后，隋炀帝改他姓杲。武则天也常常给人改姓：唐高宗的王皇后、萧良娣被她杀后，还给改姓蟒、姓杲；两个反对她的侄儿改姓虺；那些起来反对她当皇帝，要恢复唐王室的李家人改姓仇……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名，例如明末的马士英是个出名的坏种，但“小人无不多才”，他的画很好。人们讨厌其人，却不忍毁弃其画。于是，把画上的署名加上点、画，改成“冯玉瑛”。而且编了个故事，说这冯玉瑛是一位善画的名妓。

姓名的被改，说明一个人的祸福；反过来，一个人的姓名，也往往影响他的祸福。

先说祸：唐朝末年四川有个军阀王建，他盖了一座府邸，大门绘以朱丹。四川人叫顺口，把它称为“画红楼”。王建手下有一个将领，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本名华洪。在王建听来，“画红楼”就是“华洪楼”，兆头不好，意味着这府邸是给华洪盖的，于是终

于出个题目，把这个有勇略、得人心的大将杀掉。清朝有一个叫高治清的，他治什么不好，偏去治“清”！让人告发到乾隆那里，给抄了家，还差点丧了命。

再说福：确实有人因名字有彩头而突然当上大官的，也还有人在自己的姓名上做文章而终于捞到好处的。宋朝元祐时有一个朱绂，是个君子人，因而上了党人的黑名单。崇宁年间又有一个自称姓朱名绂的人，为了想引起蔡京的青眼，于是在姓名上做起文章来。他上疏说：他与“奸人”朱绂同名同姓，为了“划清界限”，免得后世把两个朱绂搞混了，他改名为谔，字圣予。蔡京果然大喜，封他个右丞的官。可惜他命不好，还没有上任就一命呜呼了，只活了四十岁。

于是一些人就免不了在姓名上加以考究。除了像朱绂第二那样的个别人之外，一般人是图个平安吉利，谁也不想找一个晦气十足的符号同自己联系起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明清之间，处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一些发了财的市民，为了挤进上等人的行列，附庸风雅，纷纷扔掉小名，搞一些官名雅号。谁知却遭到一些人的嘲笑，编成小曲来唱：

粟米的唤子良，

卖肉的呼仲甫，

开张卖饭的呼君宝，

磨面登罗底叫德夫。

还是赵太爷思想在作怪，似乎这些“雅号”也只有他们那个阶层的人才配有。其实，市民固然有他的俗气，但早就有了雅号的绅士们，又比市民高几分几寸？

革命的人们也有在这方面努力的。清末有人改名“扑满”、“打清”之类就是。诚然，这类称号，同实际的革命可以相干，也可以并不相干；但这种改名，倒是反映出时代精神和民气。这种改名以明志的做法，在“十年动乱”的开头那几年，也是一种时髦。人名、地名、店名……都大改特改。有自己改的，有江青“御赐”的，十分可观。甚至波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吴琼花改名吴清华，乌豆改名雷刚，红嫂改名英嫂。似乎一经改动，就显出更加深厚的思想政治内容。新出来的作品更加效尤，正面人物不姓洪就姓高，反面人物不姓钱就姓刁，中间人物不姓温就姓袁。一听名字，便知道他是“高大全”人物或“反革命”、“右倾”分子。这一切，“革命”气味果然十足，可惜的是革命词汇毕竟有限，因而难免重复。也正因如此，很多名字和所属的对象渐渐都淡忘了，我只记得一个女将，姓胡，名闯，大有横扫一切之势，很有时代精神，那种“闯”劲，也真是“胡”得很。同样的女青年，不干出她所干的事，说不出她所说的话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胡闯确实达到了目的。那种名不副实的改名，实在是不及她的。

1979年1月

居其位而知其任

汉代的陈平，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丞相。一天，孝文皇帝问右丞相周勃一年里决狱和钱谷出入的数字，周勃答不出来，急得浑身冒汗。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要了解这些数字，可以问经管这些事的廷尉、治粟内史。宰相的任务，只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对于这个答案，孝文帝很满意。周勃责备陈平不告诉他如何对答，陈平说：“你居其位为什么却不知其任！假如皇帝问你长安城有多少盗贼，你也硬要回答吗？”

居其位而知其任，这就是说，懂得自己的岗位该管什么事情。一国的决狱、钱谷出入数字，宰相该不该过问，这是个可以讨论的具体问题。但是，总有该管的，有用不着管的，这点恐怕毫无疑问。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什么都想管，显然很难管好；不该管的

使劲去管，该管的一定会放松甚至没人管。陈平概括的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合用，而且很有必要议一议。那原因，是这些年来，不仅有人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而且还老是以为自己已经知其任，还按照他们这套标准来规定别人的“任”。

居于农民这个“位”，他们的“任”首先是耕田种地；耕田种地之余，可以唱歌跳舞，可以吟诗作文。如果农民都把锄头犁耙收起，专门写诗，唱戏，写“批判”文章，那恐怕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了。然而，曾经有人把这当作农民的样板。

居于学生这个“位”，他们的“任”首先是读书，也可以兼着学点别样。如果要学生把课本都收起，专门种甘蔗、做灯泡，那恐怕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了。然而，曾经有人把这当作办学的样板。

居于工人这个“位”……

我得赶紧声明一句，以免给抓辫子。我并不反对农民业余写诗唱戏，更没有认为在农民中不可能产生诗人、艺术家。但是，这里首先是业余，而不是把它当作比耕地更重要的任务。可以在农民中出诗人、艺术家，却不可能人人都是诗人、艺术家——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只要还有分工，就会有以什么为主的问题。既然叫做农民或农业工人，那么，总得让他们把主要心思放在农业生产上。

我还得再声明一句：在口头上，并没有人明确无误地认为农民的首要任务是做诗唱戏；他们甚至还宣传说正因为做诗唱戏，那里

的农业生产特别好，粮食特大丰收。我讲的是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做法：让农民去吟诗、唱戏，而让别的人例如解放军或学生去给他们种地。本来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练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都不是种地。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农民当诗人，让解放军去替农民种地这一类奇怪的要求和做法。一讲到知识分子，有的人就条件反射地皱眉头，千方百计地证明他们没有知识，而那方法又正好是脱离他们的“位”去苛求。干校一位军代表，不止一次拿一个教师不懂得垒鸡窝而砸死了鸡的故事说明知识分子无知识，要改造。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可靠程度，但是我怀疑它的典型意义。垒鸡窝那样简单的事情并不难学，不会垒鸡窝并砸死了鸡的知识分子也可能会有。但是，如果这个教师的书教得很好，经他教育的小学生，读完一年级就能识上千把字，还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那么，不会垒鸡窝算得了什么过错？难道不该把他提升为特级教师，反而非得嘲笑、批斗，不让他教书，而让他专门去垒鸡窝吗？按照这个奇怪的标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恐怕至少也得靠边站。关于陈景润的种种传奇和他的遭遇，可以证明我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人无完人。一定要会垒鸡窝才能当教师，会唱戏才能当农民，确是一种要求别人比完人更完人的奇怪标准。其实，就是这个嘲笑别人无知识的军代表同志，他自己也证明了自己的知识并不是无限大。为了“五一”劳动节也不给干校学员放假，他“无师自通”地口吐大言：“劳动节，劳动节，顾名思义，劳动节就是劳动的节日。”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他的知识远不如那个不会垒鸡窝的教师。

很难责怪他连这个很普通的常识也弄错了，因为他的“任”本来就是练兵打仗嘛。

这种“位”与“任”的乱套，有时简直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务正业的挨批斗，被描绘成一种异端。不务正业和不准别人务正业的，倒反而成为先进范例，甚至坐上了“直升飞机”。于是，一些基层干部，他们的“任”本来是领导发展生产；但是，却忙着砍果树，拔快成熟的花生苗。一些管干部的，他们的“任”本来应当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发挥干部的作用；但是，却忙着让一些干部停止工作，任他们审查来审查去，白白耗去了大好的时光，而且至今也并未急着去解决问题。如此这般地弄来弄去，不少人才被糟蹋，一种糟蹋人才的人才却大行其道。社会主义国家的“位”，也几乎把自己的“任”也含混了，颠倒了，弄错了。那代价确实不小。

不解决这个居其位而不知其任或虽知其任但不顾其任的情况，要使我们的国家大踏步地向四化前进，恐怕是困难的。人们不是在苦恼于老是一些外行在那里领导内行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说，周勃倒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他“为人木强敦厚”，对开国有过很大贡献，在平定诸吕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陈平批评了他之后，他“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谢病请免相”，让陈平发挥作用。当然不需要都请病假；但是，承认自己不行，而不是以不知其任为荣，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1979年2月